

有争议的 知识

Contested Knowledge: social theory in the postmodern era

[美] 史蒂文·塞德曼 著
Steven Seidman

刘北成等 译

后现代
时代的
社会理论



社会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美] 史蒂文·塞德曼
Steven Seidman

著 刘北成等 译

Contested Knowledge: social theory in the postmodern era

有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社会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美)塞德曼著;刘北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学译丛)

ISBN 7-300-04499-9/C·201

I. 有…

II. ①塞… ②刘…

III.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

IV. 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652 号

社会学译丛

有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

[美]史蒂文·塞德曼 著

刘北成等 译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6 插页 3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4 000

定价: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关于本书及其作者

本书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教授是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本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解释框架，也是对社会学理论史重新梳理和诠释。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一直到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流行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如吉登斯、布尔迪厄、沃勒斯坦，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美国的当代的各种社会运动，等等，作者试图放在一个统一解释框架中予以理解。

作者的解释框架有两条主线，其一是社会分析，其二是道德立场。作者认为，任何社会学的抽象理论，都必然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起源，并且一定植根于相应的道德信仰之中。以历史社会起源和道德信仰来解释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方法论的体现。用这种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方法批判和梳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和思想史，就会发现，我们以往的社会学知识，作为既定的、大一统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对社会现象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解释，就有多少不同的互相抵牾的含义，但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可以在理论范围内证实自己或证伪其他。

后现代方法论注重社会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强调分析该理论所预设的前提和所预设的解释范围。更重要的是，后现代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理论的建构，都与社会权力(包括社会运动)相关。所以，社会理论也无非是为某种特定的社会构造(social construction)设定规则和规范而已，正因为社会理论是如此地产生和建构的，就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评价其核心概念和方法论的含义，以及该理论在政治实践中

的效果。后现代方法论还注意到，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理论，有些社会要素被“神圣化”了，而有些要素被故意忽略了；有些社会要素被“放大”了，而有些要素被“扼杀”了。社会理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任何社会理论，一方面不可避免地来源于某种社会权力，成为这种权力的系统话语，并为之服务；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社会性，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采取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肯定或否定某种政治实践，维护这种社会权力或抵制其他的社会权力。即便是所谓的“科学”社会理论，也同“科学”的社会势力相关，也起源于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条件。当“科学”的社会理论成为理论世界的霸权话语，也就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势力成为了统治性的社会权力。

从后现代方法论角度，社会理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真理”，不可能通过积累而形成真理体系，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极限。社会理论属于知识的范畴，要应用这种知识，就要分析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以及在实际中的局限性。当社会学知识被应用在利益冲突的环境中或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变得“有争议”了，社会学知识所标榜的“真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当我们进入了“后现代”时代，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大一统的政治权力被极大地消解，社会被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势力多元化，原来传统的经典性的社会学知识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性的话语霸权，在实践中无法坚持其统一的道德立场。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状况，使得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史处在危机之中。如何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如何看待社会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沟通“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就成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重大课题。作者的这本著作可以看做是解决这些课题的重大努力。

作者史蒂文·塞德曼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长期研究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倡导后现代方法论。也许是因为他公开提倡社会学的道德立场，使得他特别注意社会变化的趋向和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阐释，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他发表了大量论文，著作等身，其中有多种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这本《有争议的知识》是他对后现代方法论的系统的和理论的总结，特别是对福柯“权力—知识”关系的阐发和实际应用。这本著作自1994年出版，1998年再版，成为美国许多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其中的某些章节，成为研究生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或辅导材料。我在美国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选修了史蒂文·塞德曼教授全部社会学理论课程，在担任他的助教期间，为他的研究工作搜集和查阅资料，使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极大地得益于后现代方法论。值此机会，谨向塞德曼教授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徐 迅

2002年 北京



前言

我可以说是 60 年代的精神产儿。当时我从大学退学、吸毒，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快乐和反叛的源泉，并努力去改变世界。我将社会想像成一个给自我和集体更新提供巨大可能性的领域。由于 60 年代最终陷入毒品、暴力、政治极端主义或者随波逐流、自暴自弃的死胡同，我跟随中产阶级的人群进入研究生院。1980 年，我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能够帮助认识自我、展望不同的未来并带来变革的学科。

我回忆起我作为社会学家最初几年痛苦的醒悟经历。我希望我的同事可以分享我关于社会学的道德观，但现实逐渐让我清醒过来。我的同事几乎从不阅读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任何东西，几乎没有人讨论具有广泛公共意义的思想；社会学的文化看起来是一个狭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学”讨论和对个人地位的患得患失造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专家领地。我惊骇于这种专业化所造就的残骸：一群具有良好价值观和意愿的聪明人，但是他们的才智受到一种基本上无视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学科文化的阻碍，这种文化与公共世界的道德、政治争论也没有紧密的联系。

对此我进行了反叛。我转向考察现代社会思想的根源，为的是呼吁社会学对抛弃道德承诺而自责。我着手一项关于欧洲社会理论的启蒙时代渊源的研究。我从以前反叛个人和社会的热情转向对改进社会学的探求。我希望从现代社会理论的最初启示中为社会学应当具有道德和政治目标找到一种依据。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东西：启蒙思想家和古典社会学正是将社会分析看做是社会批判和变革的工具。

随着对 60 年代记忆的消退，我本人的写作也开始变得不再清晰。在美国 80 年代厌恶政治的气氛中，我正在吸取社会学的学科文化。我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理论

家”，似乎理论具有不同于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独有问题和价值。我迷失在对“理论”的探讨中，我开始感到自己的工作缺乏成果和意义，感觉自己背离了当初想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时的道德和政治动机。

艾滋病危机唤醒了我。那是在1981年，我记得当时从媒体上了解到一种夺去同性恋者生命的神秘疾病。我还记得当时媒体的歇斯底里、公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以及政府的漠然。那时我正居住在新墨西哥州，努力完成一本论古典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在我专心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涂尔干的《自杀论》之时，艾滋病带来的致命危险看起来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艾滋病愈演愈烈，汇入了对60年代社会反叛的反攻倒算。美国似乎再一次陷入了政治和文化战争的阵痛中。身为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我的整个生活感到了痛苦和脆弱无助，我所看重的进步文化遭到了攻击。艾滋病就像一个敌人，夺去了我朋友的生命，也威胁着我个人的生命。在这场社会和个人的巨变之中，我的关于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让我觉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整个社会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用一种说法讲，我在80年代初离开了社会学。虽然完成了一本关于古典社会理论的书，但那时我研究的重心已经明显发生了转移。艾滋病和对60年代进步运动的反攻倒算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收集出版物中有关艾滋病及这股社会逆流的所有东西，不再阅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随着有关肉体、性、性别和知识的政治逐渐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我发现自己被女权主义的文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研究、种族理论、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所吸引。在阅读和撰写这些领域的文章时，我出于实际目的退出了社会学，不再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

然而，我最终又回归了社会学，至少是与社会学和解。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写这本书的。那么原因何在？

一个青年在争取独立、使其个性得到充分保证之后，会带着一种重新找回的归属感回到他或她的家庭。也许我就是像这些人一样重归社会学这一学科。社会学是最初给我营养，为我提供思考自己和社会的新思维方式的共同体。我深切地知道自己对社会学的怨恨有多深，爱就有多重。我意识到社会学乃是我的一个家园。我喜欢把它比做一种大家庭，也许比做教会更合适。我们激烈地争吵，有时甚至发怒，那是因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许多信仰和价值观是与我们的社会观念相联系，是因为我们彼此关爱对方，即使不总是以一种很亲密的方式，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分享共同的学科历史和文化。

我虽回归社会学，但已不再是“旅行”之前的那个我。如同其他旅行者一样，在一种异文化中度过很长时间之后，我也逐渐将自己的故乡文化视为众多文化中的一种。我将社会学的假设、概念和知识相对化了。特别是我逐渐认为，战后社会学家之间的理论争论不过是一种关于“社会”辩论的传统。社会学理论家错误地以为，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例如社会行动和秩序的逻辑、冲突范式与秩序范式之争，或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之间关系的问题，都切中“社会”的性质。这里的预设是，如果无论谁在任何时候只要认真思考这个社会世界，那么他或她最终会集中精力于这些问题。人类学家会说，这正是族群中心主义的一个例证，这是一种为某个群体特殊的价值和观念要求普遍性与合法性的实践。举例讲，战后西方女性主义者没有将这些理论问题界定为核心问题。恰恰相反，女性主义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解释重要范畴的性别概念、男权统治的根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认同和差异的性质，支配与反抗的多元性等。将社会学理论相对化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的重要性。社会

学理论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并值得捍卫的内容，尤其是它对于自我的社会理解，它用于理解各种制度及整个社会的丰富的概念性语言，它关于社会发展、社会秩序和社会危机的论说，以及它的文化社会研究的传统。然而，特别是在最近的 20 年里，社会学理论过多地远离了公众生活，过多地把自然科学当做偶像一样追随，已经到了迷失自我的程度。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抛弃了自身作为社会批判和社会变革的工具来参与世界的道德和政治意图。

我重返社会学如同我最初进入社会学一样，希望找到一个社会分析受到充分重视的家园，因为这种分析是受为了世界更加美好的心愿所激励的。这不意味着要放弃经验分析，更不意味放弃分析性视角。然而，我坚信社会学的目标不在于积累知识、发展一门社会科学或建立社会学的体系，而是在于使其自身成为关于当前与未来社会面貌的持续的对话和冲突的一部分。200 年来指引着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希望就是，知识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其主要价值蕴含在它所想像和帮助创造的各种生活中。本书同样受到这个希望的鞭策和鼓舞。



致 谢

感谢为本书各章节的草稿提供意见以及为这本《有争议的知识》出版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包括那些匿名的人)。十分感谢杰夫·亚历山大、帕特·阿卡德、鲍勃·安东尼奥、莫勒菲·阿桑特、齐格蒙特·鲍曼、罗伯特·贝拉、罗斯林·博洛戈、朱迪思·巴特勒、克雷格·卡尔霍恩、帕特里夏·克拉夫、艾迪思·库兹沃尔、理查德·拉奇曼、米歇尔·拉蒙特、查理·勒莫特、巴巴拉·拉斯莱特、琳达·尼克尔森、多萝西·史密斯、斯蒂芬·特纳、大卫·瓦格纳和杰弗里·威克斯。特别感谢杰夫·亚历山大以及尤其要感谢我多年来有幸与之一起就许多问题展开讨论的琳达·尼克尔森。假如没有艾琳·佩莱格里尼和莎朗·鲍姆加德纳出色的秘书工作,本书不会如此顺利地出版。感谢切特·米克斯为本书更新索引所做的工作。



导 言

现代社会理论用一种独特的承诺宣告了自己的降临——运用科学知识帮助人类摆脱压迫走向自由。通过将人类的生活状态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人文科学预期人类有可能理性地塑造自己命运。如果习俗和社会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自然法或神法的产物，那么它们能不被设计成对全人类有益吗？

相信科学能够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信念植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中。社会科学家作为公众的教育者和倡导者，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大众启蒙。社会科学家们力图提供知识，揭示自由受到的威胁和社会进步的前景。人文科学的先驱者孟德斯鸠、孔多塞、马克思、孔德、韦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W.E.B. 杜波依斯，提出了他们自己对社会起源和意义的想象理解。他们的思想致力于具有公共道德含义和政治含义的问题，例如，不平等的起源、科层制对自由的威胁、社会中黑人的生存状态、对妇女的剥削。对于人文学科的奠基者们来说，知识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大众启蒙和社会进步的手段。

当代社会学理论还没有放弃这个社会目标。社会学家们不断提供针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试图启蒙广泛的大众。但是社会学理论乃至一般的社会学日益与公共生活疏远分离，这对社会学和公共生活都是不利的。随着社会学理论家放弃大众教育者和倡导者的角色，他们的思想也失去了社会针对性。而且，公众也因社会学逐渐丧失社会权威性而受损。社会学一直是公共论战的催化剂，而且是观察自我、社会和历史的社会视角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社会学家们陷入了狭隘的学科问题，公共官员、活动家、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媒体评论员就担当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不幸的是，这些群体通常

褊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问题或政治事件上(如军人中的同性恋、波黑塞族的侵略);他们迫于压力而去迎合商业时间表和商业标准。因此,他们的社会思想常常缺乏人文科学特有的那种理论深度和历史深度。我认为,有活力的民主大众文化需要由人文科学精工制作的批判性社会图景来滋养。

社会学理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许多理论家依旧立志担当公共批评家和教育者的角色,但他们却日益与公众分离。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越来越远离普通的大众文化。社会学不断地产生具有杰出天赋并富于想像力的理论家,但他们通常只是与这个专家群体内部成员交流。社会学理论这种日趋严重的与世隔绝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理论家们根本不使用广泛的公众语言;这个学科文化的传统和关注焦点使得他们的思想既不能让普通大众接近,也与日常生活中讨论当下道德、政治事务的方式无关。令人沮丧的是,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学理论几乎无人去读。

社会学理论处于危机之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的科学化。至少自战后以来,理论家就不间断地寻找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普遍客观的理论。许多理论家认为,只有保证他们社会思想的真正的客观性,社会学才能维护其公众权威性并履行它的社会启蒙的承诺。不幸的是,核心前提、概念、解释模型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基础,而社会学家们无法在对这些东西达成共识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社会学宣称自己是一门科学,而这种宣称不断遭到大众和社会应用者的质疑。而且,社会学增加自身科学性的努力造成了社会学家,特别是理论家之间忙于就晦涩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争论。社会学理论家正在迅速放弃公众教育者的角色。

就在社会学理论滑向与社会隔绝状态之时,公共话语却变得日益尖利。社会学必须恢复其公共教育者的角色,不仅是为了重建其公共权威,而且是为了促成公共领域的复兴。在这一点上,我力主社会学理论重新回到公众争论和冲突的中心。社会学话语不应仅仅由学科内部的传统和争论所推动,理论家应该认真参与有关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公共世界的争论问题的语言。社会学家应该恢复社会学学科的道德推动力,少以科学家自居,而更多地充当参与现实问题的公共教育者。我设想这样一种社会学:既保持概念分析和经验分析的丰厚传统,同时又恢复其公共角色和公共权威。如果我们抛弃那种自命为获取客观普遍知识的科学的错误假设,如果我们接受自己作为故事讲述者和社会批评家的角色,我们或许能够重新为社会学注入新的活力,并为加强民主大众文化做出贡献。我期待这样一种社会学:不忌惮道德倡导,坚持人文研究应服务于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初承诺。这种社会学应该担当起对它所参与创造的世界的责任。

□ 承诺的失落:危机中的社会学

1989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在旧金山举行。与往年一样,几千名社会学学者聚在一起提交论文,交流思想,结识出版商和同行,求职面试,与老友叙旧。每届年会都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来组织安排小组讨论和论文讲演。1989年会议的主题是“宏观与微观的相互关系”。个体层面的行为如何与群体或制度层面的行为相关联?我们该如何解释社会生活既是个体行为又是制度变迁的产物?

在与搞理论研究的同行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会议主题确定为“宏观—微观的联系”实际上是社会学理论家的一大胜利。这些同行解释说,所以这样

讲是因为社会学理论家首先把这个问题当做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来加以关注的。在他们看来,将“宏观—微观的联系”确定为会议讨论的主题标志着社会学理论成为主流,从一个专业领域转移到学科中心的恰当位置。在一些理论家那里,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或许社会学在当时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其特点是,理论与研究紧密结合,理论承担中心角色。

我无法与我的同行们一道分享这种胜利的喜悦,会议确定“微观—宏观的关系”为主题让我备受打击。对我来说,这恰恰是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发生错误的一个标志。我想,那是1989年啊,我们正身处自越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国危机的中心——旧金山。当时艾滋病已经夺去上万人的生命,已染上这种传染病的人据估计数以百万计。艾滋病是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它不但带来可怕的死亡以及公众对公共卫生的忧虑,而且还使各种社群、意识形态、机构陷入碰撞和冲突之中。不仅像同性恋者、少数民族之类的特殊群体卷入这场社会动荡之中,而且地方、州和联邦各层次的医疗、经济和政府机构也都受到了艾滋病这种传染病的挑战。就在这场社会危机的笼罩之下,就在艾滋病所造成的混乱随处可见的旧金山,几千名社会学家汇聚到此。这些人不把讨论焦点定在艾滋病引起的社会危机上,定在个人、艾滋病与制度之间紧张甚至致命的关系上,不去分析个体、社区和机构对艾滋病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有时相当勇敢、有时应受谴责的反应,而是聚到这里来澄清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

回顾社会学理论家们的发言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在一个以“从交换到结构”为题的分组会议上,发言的题目包含诸如“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和“理性组织”之类。另一个以“社会理论中的行动和结构”为题的分组讨论中的论文有:“行动、互动与互动秩序”、“权力与行动者:吉登斯结构理论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结构与行动者”。在另一场重要的题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微观—宏观之间的关联”的分组讨论中有这样几篇论文,题目分别是:“宏观—微观之关联:社区与社会”、“社会学理论中微观—宏观之关联”和“结构心理学与微观—宏观之关联”。其他的分组讨论包含一系列同样的题目:“通过专家体系建立理论模型”、“矛盾或者最大化:理论和一种替代性情绪结构主义”、“埃米尔·涂尔干与卡尔·荣格”。公平地讲,确实有一些论文和分组讨论旨在触及当前的政治问题、国家建设和社会危机。但是,我没有在任何一个理论组的分组会议上发现有哪怕一篇发言的主题与艾滋病有关。

我独自暗想:这么多的社会学理论家汇聚到这个重大社会危机的现场,他们怎么可能对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呢?难道社会学理论家真的变得如此狭隘,以至于对他们自身逐渐脱离社会现实浑然不觉吗?

为何社会学理论会侧滑转向关注一系列高度抽象和远离社会的问题,如微观—宏观的联系、行动者与结构、行动与秩序、结构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原因迫使社会学理论家探讨社会行动的性质、社会秩序基础的一致性或冲突性、行动理性,或者社会制度的实体化等问题呢?我不想完全否定这些问题的价值,不过,我相信,正是理论家们对这些元理论或哲学问题的痴迷排斥了他们对当下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

当前的社会学理论的类型不止一种。虽然很多社会学理论热衷于追求建立一种社会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但是,其他一些理论家则代之以同样既虚幻又褊狭的创造一种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的方案。他们的目标是解释宇宙的社会法则或者将社会还原成一套普遍原理,就像物理学可以格式化成一组数学方程式和公式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

些科学的理论家们反对哲学理论家的含混晦涩，他们自己的工作最终也同样往往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他们要么阐发一些大而无当、空泛陈旧的普遍原理，要么提议用复杂的解释模型来解释厚重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些模式中，无数的变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建立起因果联系，致使理论含混晦涩，不仅对研究者毫无用处，而且对多数理论家来说也无法理解。

社会学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对于哲学基础和纯粹科学性的探求中。理论家们没有忘记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些理论家并不侧重将社会学解释为旨在揭示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和法则的科学，而是更多地将社会学定位为一种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事业。他们认为，社会学应更靠近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这种“道德”模式中的理论是一种有价值判断、有社会责任的实践。

作为道德探索的社会理论常常采取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理论家们没有忘记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一些理论家并不侧重将社会学解释为旨在揭示社会行为的基本意义和法则的科学，而是更多地将社会学定位为一种批判性和解释性的事业。他们认为，社会学应更靠近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这种“道德”模式中的理论是一种有价值判断、有社会责任的实践。

作为道德探索的社会理论常常采取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理论家将社会现实的起源、意义以及可能的未来结果整理成社会叙事。他们提醒我们注意潜在的社会危险，告诉我们可能的补救方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这里有些故事讲述阶级冲突、男性权威、宗教信仰的衰落、社会团结的危机、社会的科层化。这些社会学家们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大众，从而推动或引导社会和政治行动。20 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家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充满想像力的有关社会发展的故事。我想，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对西方自由文明所作的宏大的社会进化论解释^[1]、彼得·伯格对西方文化世俗化的有力的描述^[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关于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对立的世界体系演变的激动人心的论述^[3]、诺伯特·埃利亚斯关于日常习俗和礼仪演化的勾勒^[4]、丹尼尔·贝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叙述。^[5]社会学理论家仍在履行公众教育者和倡导者的角色，但他们的声音被建立科学的或哲学社会学的呼声所淹没。

我总结出三种风格迥异的主要理论类型：哲学的、科学的、道德的。而事实上，大多数的理论家都将这三种社会分析的类型融为一体。比如说，一个主要是“科学”类型的理论家可以在某些方面“有哲学味儿”，也可以使自己的理论浸透道德期望。由于理论家会利用各种不同的理论类型，我们可以预期他们的著作会呈现某些张力和冲突。例如，一个将理论视为科学事业的社会学家会不时地以哲学方式来为这种事业辩护，这反而为哲学类型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合法性。

在本书中，我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内的人文研究的“科学”视角和“道德”视角之间的致命张力。自启蒙时代社会理论诞生之日起，经过古典时期直至今今天，这种冲突就一直居于社会理论的核心。我的主要目的是，让一种把社会科学看做具有道德意义的公共实践的视角回归社会理论的核心。

□ 社会理论中的致命张力

社会学理论有关于社会科学的“科学”视角和“道德”视角之分。科学的视角把社

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视为能够获得可靠社会知识的惟一途径。我们的常识，日常的社会观念以及诗人、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对于社会的理解都被说成是反映了个人的偏见和看法，而社会科学则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和确切的。社会科学观点被说成是对世界的反映，相反，平民百姓的观点被说成是反映了个人兴趣和主观经验。

从科学视角来看，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有两个方面：统一社会知识，论证社会知识。科学理论家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社会行为的整体图景。他们的目标是将研究者积累的大量经验研究成果汇集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与今天所有的学科一样，社会学也分成许多专业领域（如犯罪、知识、性别、城市、人口）。社会学家被培训成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而且往往局限于某个领域中的某个方向。例如，专门研究犯罪的社会学家可能将监狱、惩罚或者刑法作为自己的专业范围。虽然研究的专业化可能会激励研究者在一些狭窄的社会经验范围内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因为数据、研究结果和概念缺乏任何明显秩序的堆积而造成经验不连贯、知识杂乱无章的状态。“科学的”理论家们站出来，努力通过发现统一的原理、普遍性法则或创造理论性整合，在专业领域乃至整个学科之内建立概念和经验的一致性。

理论家们不仅旨在为社会知识提供统一性和一致性，而且希望为饱受冲突之苦的学科充当终审上诉法庭。社会学还没那么幸运可以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对事实、方法、研究发现、解释以及学理等都有不同意见。就像在一个家庭中，争执不下时可以允许各持己见，但这有可能损害社会团结。与家庭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分歧引出一个附带的危险，即社会学失去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如果社会学家无法就学科的最基本问题（例如社会事实的性质、方法论前提、研究目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模型）达成一致，那么社会学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日常的社会争论或政治冲突呢？如果社会学可以被描述为我们关于社会的私人和公共对话的延伸的话，它真的应该得到目前这种程度的公众支持吗？社会学内部的这种纷争实际上危及其公共信誉。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学理论家已经站出来宣称承担社会学真正仲裁人的角色。

为何理论家想对社会学家之间的关于经验和概念的争论进行裁决？从原则上讲，理论家力图制定实用型社会科学家在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概念之间做出选择的标准。我之所以说“原则上”，是因为迄今为止理论家之间没有就哪种分类标准更为合适以及如何达成一种共识取得一致。比如说，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有效性标准，如客观性、全面性、概念的经济性、证据充足性、可预测性、经验丰富性、方法可靠性、道德正当性以及社会变革，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虽然从理论上讲，标准的产生需要通过围绕对社会和社会知识的基本假设的分析而展开长期的批判性交流的考验，事实上，就像社会研究者成为经验分析的专家一样，理论家成为概念分析和文本分析的专家。研究者应该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世界是怎样的，而理论家则考察这些研究者的文本，判断他们的陈述所反映的究竟是外在客观世界还是他们的个人世界。理论家们乐于对什么算得上知识做出仲裁。在一个像社会学这样分裂的学科里，具有通过宣布哪些东西算得上知识来对冲突进行仲裁的身份，就能够赋予理论家很大的威望。

从我所讲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理论家良好的初衷已经将他们带入了迷途。在致力于统一社会知识和证明社会知识的过程中，理论家们已经迷失在概念分析和文本分析的灌木丛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世界，一个只有社会学家才能够、才愿意光顾

的世界。在过去的20年中,许多社会学理论家热衷于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探讨,而这些问题与实际研究者及公众基本无关。而公众渴求那种能够反映他们生活的有力量的社会思想。即使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呈现出非凡的才气,他们工作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除了同行理论家外,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晦涩难懂。这就使他们的工作在研究者和广大公众眼中或多或少地显得不着边际。

但是,断言社会学理论缺乏当代价值尚为时过早。虽然,我痛心于许多理论家屈服于对哲学基础和科学一致性的幻觉般的探求,但是,另外也有一些理论家仍在制作关于社会发展、危机的新颖叙述和批判性视角,力图推动公众启蒙及其行动。人文研究的道德路径——即把经验性社会分析与公共冲突结合起来,并力图影响这些冲突的结果——依然是当代社会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学的道德视角的重申乃是指引本书的批判动力。

尽管许多理论家在追求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的科学的时候走进了死胡同,大多数理论家并没有放弃道义希望,即希望理论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益于生活。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多数的理论家,承认社会科学是以它对人类的益处作为其最根本的理性原则。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的部落总的来说是一批关心人民的好人,他们相信科学对社会有益。然而,可悲的是,这种被许多社会科学家深刻体会到的道德期望,并没有被作为判断社会研究和理论的价值的一项重要标准而得到承认。对于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它不过是一个期望,一个由衷的期望,不应该影响对方法、概念、解释和研究目的的研究。这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社会研究中不占据重要地位。不管一个社会科学家多么希望在其工作中排除道德承诺,这种承诺依然存在。遗憾的是,虽然道德承诺犹存,但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或是被整合进社会科学家的精心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有些社会科学家明确将道德承诺置于其工作的中心,我认为其中包括赖特·米尔斯、罗伯特·贝拉、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6]这些社会科学家的价值观、社会旨趣以及某些时候明确表达的政治或政策目的指引了他们的理论决定和经验决定。并非所有坚守社会科学道德原则的理论家都愿意放弃客观性或科学正当性的说法。例如,马克思和最近的哈贝马斯,他们倡导一种综合: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我们将看到的其他一些理论家否定人文研究与科学观之间的联系。他们设想一种后科学类型的人文研究,这种研究的价值在于其担当起教育和道德倡导的载体的角色。对于社会科学的道德观支持者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他们的道德倡导与知识追求结合在一起。此外,即便人文研究的最坚定地倡导道德观的人也必须承认,他们思想的有效性依赖于他们的公共权威,而这种权威可能被他们的道德主义所削弱。后面在分析社会科学的意义及当代角色时,将会考察科学观与道德观之间存在的这种致命张力。

□ 概 述

请允许我在此澄清一下本书的写作目的和研究范围。我不是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理论史。史学家会关注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各种不同的社会分析语言(例如宗教、诗歌、小说、科学、叙事)之间的斗争以及影响社会理论形成的那些确切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力量。我做的不是以上这些,但是我的确在以一种历史方法工作。在第一和第二部分,我勾勒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历史。我将从启蒙运动讲起,接着追溯从古典社

社会学直到本世纪(20世纪——译注)学科性社会学理论兴起的线索。

为何我否认自己重写社会理论历史的同时还讲述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原因有两点。第一,我认为社会思想应被置于其所在的历史语境之中,思想应被看做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文化和制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社会理论卷入特定社会斗争之中(如围绕着国家建设或阶级和性别支配)的观点,对于挑战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种主流观点将社会理论看做是正在进行的关于社会世界一般性质的普遍对话的一部分。我将人文研究当做对历史具体条件和冲突的反应看待。理论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做些事情的努力。理论家们有其想要达到的特定目标。我依赖的是一种对人文研究的语境化的和务实的理解。第二,我借用,至少是暂时借用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标准解释框架,是为了提出对它的怀疑。我可以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历史来质疑传统的历史。但是,我也能够通过打乱常规的故事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如何,这正是我想要做的。在第三部分里,我将勾勒出当代社会理论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在第一部分中,我从启蒙运动中追溯现代社会理论的开端和“古典的”传统。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在18世纪的欧洲和盎格鲁-美洲国家,社会科学的学科尚不存在。不过,一批像伏尔泰、休谟、弗格森、孔多塞、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学者,不仅在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领域中著述,而且他们还发展了被其后继者视为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开端的关于人类行动的社会解释。“人的科学”或“社会科学”这两个术语正是由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后来被称作启蒙思想家)首先创造出来的。虽然这些启蒙思想家宣称他们的社会思想是客观、普遍的知识,但我认为他们思想的核心是特殊的道德承诺(社会价值和理想)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旨趣。更准确地说,启蒙运动时期社会科学的建立实际上是新的社会文化精英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要摧毁的是那些维护教会、君主制和统治贵族精英制度的宗教文化。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被用来服务于现代化和增进试图建立自身社会合法性新精英的利益。

启蒙运动的第一代后继者继承了他们许多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法国的孔德和德国的马克思是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后继者。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呼应了先驱者们宏大的社会科学视野。他们讲述了人类如何通过扫清妨碍我们自身成长的障碍而取得社会进步的全部历史。孔德与马克思肯定希望我们相信,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和理想代表了真实的历史进程。这似乎是把科学与道德相互融合在一起:科学揭示了历史的法则——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未来——从而确立起正确的社会规范和原则。但是,他们社会观的巨大范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自称具有社会有效性的可信度的怀疑。

到19世纪下半期,社会科学逐渐奠定起其作为社会真理的惟一权威语言的地位。宗教、哲学或日常社会思想被认为是不可靠或纯粹是“主观的”。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主观的或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信仰)之间的二分法逐渐取得优势地位。社会思想要想具有公共权威,就要自诩具有科学性;社会思想一旦被贴上“意识形态”这一标签,就大大丧失了公共信任。19世纪,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观,每一种都以科学性自诩,同时每一种也都被其对手攻击为意识形态。

现在许多史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家都认为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是19世纪末两位最伟大的社会思想家。确实,一些史学家称这两位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带来了突破。虽然孔德和马克思使用了科学的修辞,他们的社会理论似乎仍然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和道德观念紧密相连。韦伯和涂尔干被认为取得了社会科学的真正突破。他们抛弃前人关于历史意

义的乌托邦观点和宏大解释，而代之以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用经验来约束的社会解释。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毋庸置疑，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人文科学的社会和知识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例如社会科学在大学获得制度性根基，人们对方法论和问题取向的经验研究给予高度关注。然而，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是受到道德和政治承诺的激励和影响的，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讲的，他们的思想都是在回应当时的全国性危机。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所做的努力是要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像他们之前的马克思和孔德一样，韦伯和涂尔干将他们的道德承诺隐藏在经验科学的语言里。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和旨趣已暴露在他们对社会的理论化和经验性的阐述之中。

我注意到古典传统中“科学”视角与“道德”视角之间的张力正在日益加强。由于以科学性自诩能够提高思想的权威性，19世纪的理论家纷纷运用科学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们要对国家大事施加影响的愿望使他们的思想带有道德和政治的特征。

证明思想具有科学性才具有合法性的社会压力促成了理论与社会的日益疏远。为社会思想谋求科学地位的做法被认为能够使这些思想及其拥护者具有公共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之间的冲突随之而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诋毁知识的和社会的竞争对手的一个有效策略就是谴责其为意识形态。“理论”开始被看成是一种赋予或剥夺科学地位的实践；它逐渐发展为一种哲学的或专家的实践。虽然我在古典传统里发现了“理论”与公共道德和政治关怀分裂的开端，但是最大的转折点乃是这个世纪社会学理论道统(canon)的形成。这种道统植根于种种宣称理论具有自主性的主张。

在第二部分，我转向了20世纪的社会理论。我探寻了美国社会学理论道统的形成，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要属帕森斯。他对古典传统的极具影响力的解释被证明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帕森斯认为，经典趋向于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标志着社会科学的一个突破，这种突破相当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自己的宏大综合、他所谓的意志主义行动理论，后来被精心阐释成结构功能主义，就是想为一般社会科学建立基础。帕森斯把理论当做自主的实践，其目的在于确定和证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并将它们阐发成一个能够提供社会综合图景的宏大概念框架。

帕森斯的宏大综合在60年代和70年代遭到了许多批评。然而，他成功地建立了争论的术语。R. 达伦多夫和P. 帕格等批评者都与功能主义社会学辩诘，但是，他们既没有质疑帕森斯人文研究的科学观，也没有驳斥他视理论为自主的专家实践的看法：所谓专家的任务是为分析性和经验性决策建立概念上的统一和提供合理证明。

到了70年代，社会科学的科学视角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学理论的正统。自那之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到关于概念性策略、合理性证明、通用范畴和解释模型的意见分歧。由此，“理论”关注于孰优孰劣的问题，如“冲突范式”与“秩序范式”、社会学解释中的“个体主义”方法与“整体主义”方法，“功能的”与“演绎的”的因果关系模型。60年代的社会动乱阻止了理论家们过于远离社会，但是，随着80年代社会行动主义的衰落和对通过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设计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度强调，社会学理论转而更加彻底地远离公共生活。文本分析取代了社会分析，构建综合性理论优先于社会批判。理论遁入到文本评论和相互批评的印刷文字中，致使当代社会学理论含糊晦涩和远离社会。

社会理论道统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在第三部分，我回顾了推翻现有道统的各种努